

清代移民後裔的歷史記憶 ——對成都東山地區的田野考察*

劉正剛
暨南大學歷史系

梁音、蘇東來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2008年12月中旬，我們在四川省社科院陳世松的安排下，在成都市武侯區龍江路小學退休教師舒畢生及胡老師的帶領下，對成都市郊東山一帶的清代廣東移民後裔進行田野訪談。

成都是天府之國和川西平原的中心，其以東偏北屬丘陵黃土地區。這一地域在清代主要屬於簡陽縣管轄；民國時期，一度劃歸華陽縣，後又劃入新都縣。今天的東山區大致包括成都市轄的青白江區、錦江區、龍泉區及新都區的二十多個鄉鎮。這裏的居民大多是在清代時來自於廣東，也有部分來自於福建、江西，大多能操客家話，形成今成都東山客家方言區。他們自稱「廣東人」，其他族羣的人則稱他們「土廣東」。此次調查主要以洛帶鎮和石板灘鎮的某些鄉村為重心。

我們在龍泉驛區洛帶鎮長安街（場）訪談時得知，長安鎮原來是一個獨立的基層行政區，後改稱金龍鎮，現已併入洛帶鎮。長安場座落在一條小河的沿岸，儘管小河已經乾涸，這條河流也許是傳統時代長安鎮與外界聯繫最便捷的紐帶。我們訪談的那天正趕場期，不寬的街道兩邊擺放著各式農業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隨便問一位趕場的人，他們都說自己是「土廣東」後代，既能說西南官話也能講客家話，並知道近10年來學界與政府加給他們「客家人」的標籤。我們隨機訪問的兩位老伯——葉伯和黃伯，他們都說自己是客家人（即「土廣東」），並聲稱當地絕大部分人都是「土廣東」，族裏都有祠堂、族譜。據葉伯說，其祖籍在廣東梅州，與葉劍英元帥有一定的族源關係。在他們居住的地區，同樣是「廣東人」的陳姓和劉姓等移民先到，將插佔的土地命名為陳家溝、劉家溝，而葉家後到，並因陳、劉插佔土地太多，不能耕種，葉家就與他們建

構了一種虛擬的家族關係，即陳、劉兩家將葉家認為「乾兒子」，把土地贈送給葉家耕種，也就是說把耕種不了的土地讓給「乾兒子」使用，所以葉家生活的村落被稱為「乾溝子」。至於黃伯說，其祖籍是廣東和平縣，其祖先娶了三個老婆，生了21個兒子，其後裔有不少人遷入四川。由於當天趕場，葉大爺開著的茶館生意不錯，裏面坐著的客人幾乎都用客家話交流。葉、黃的祠堂座落在鄉間，族譜也放在鄉間家中。

我們在龍泉驛區金龍鎮石碾村二隊考察時，在一個山坡上遇到一戶人家，女主人姓葉。據她說，其丈夫張先生祖籍為湖廣麻城孝感鄉，原為四川富順縣人，被葉家招贅上門。我們自稱為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人員，她對此頗有興趣。我們問她何時知道自己客家人的身份時，她回答是近些年的事，並說原先生活在這裏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土廣東人」。至於這一稱謂是他們自稱，還是湖廣人等移民的他稱，她已經無從知曉。每當她回答不了我們的問題時，她都會詢問在一旁的父親。父女兩人的相互補充，使我們對土廣東人在東山的生活有了不少認識。

葉女士有兩個孩子，他們並沒有跟葉家姓，而是跟隨丈夫姓張。當我們就她為何不跟女家姓時，她說家裏老人說，不管跟誰姓都無所謂，只要在老時有個端茶倒水的就行。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擔心孩子上學時會遭到同學的譏諷，因為在東山的孩子一般都跟父姓。一旦孩子跟母姓，不僅孩子尷尬，而且也會暴露其父親的招贅身份。或許這才是葉家招贅又讓孩子隨夫姓的重要原因。從中可以感受到在東山客家地區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交織。葉女士還說，以前客家婦女是不能參與祭拜祖先活動的，現在卻可以了。我們特意向她詢問有關家族祖墳的問題，她

說她們家有一位姓朱的祖婆（至於世代，無法知曉）是從簡陽三星遷到萬興鄉羅家廟安葬的。

（其實三星也好，萬興鄉也罷，在清代都屬於簡陽縣管轄，只不過對於葉家來說，這已算比較遠的遷葬了。）

我們從葉女士的談話中還瞭解到有關客家地區女性纏足即「裹腳」的情況。葉女士說，在她小時候，家裏的祖母、外婆都纏足，周圍其他老年婦女也多纏足，且這些婦女都參加農業生產，裹腳並沒有影響婦女外出勞作。可以想像，當年客家婦女遷入四川後不久，就吸收了當地流行的纏足風氣。¹明清時期，廣東本土流行天足風氣，清初吳震方在《嶺南雜記》中記載：「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閨閣則纏之，婦婢俱赤腳行市中。親戚餽遺盤槥，俱婦女擔負，至人家則袖中出鞋穿之，出門即脫置袖中。」²乾隆時張渠在《粵東聞見錄》卷上也記載：「嶺南婦女最苦，多不裹足著屐，其上戶女則纏足亦在十一、二歲後，若下戶偶爲之，則群相詬厲，以是爲良賤之別。」³客家婦女進入四川後，從故土的不纏足到逐漸纏足且相當流行，但並沒有改變她們參加田野勞作的習慣。

神靈信仰是我們在鄉村社會調查時常問及的話題。我們向葉女士打聽當地神靈祭拜時，尤其是女性拜神求子的問題。她說，現時當地沒有什麼廟宇，也很少拜神。但在以前，當地婦女在每年農曆三月初三都會去洛帶鎮的燃燈寺（當中供奉着觀音菩薩）參加童子會，目的是求子。從當地纂修的地方志可知，在清代時，這裏應該有南華宮、天后宮、萬壽宮等廟宇，裏面供奉的神靈爲六祖、天后和許真君。看來傳統的神靈信仰，已經被她們這一代成長在新中國的人所淡忘。其實近年許多移民廟宇如南華宮、萬壽宮和禹王宮等已被復修，只是鄉民已對這些廟宇感到陌生。這些廟宇在清代是各地移民身份認同的一個標誌。她告訴我們當地客家人之間以及客家與其他移民羣體之間，好像沒有發生過衝突。

我們在洛帶鎮石碾村三隊考察的重點是羅氏家族的白氏祖婆墓。從陳世松編著的《四川客家歷史與現狀調查》⁴中得知此墓，舒畢生亦曾於

五年前目睹過該墓，但現在已記不清該墓的具體位置，因此我們唯有在途中邊問邊找。在此過程中，我們目睹了客家移民後裔居住的丘陵山區地帶的大致狀況，領略到這一區域非常濃厚的客家氛圍，最典型的特徵就是客家方言的普遍使用，以及村落中的人幾乎都認同自己是客家人。

經過向路人問詢，我們大致瞭解羅氏太婆墓的方位，在經過村裏一處相對高大的房屋時，以一開始並沒有看清門楣上的字樣，但大門兩旁牆上張貼著許多長安鎮石碾村有關計生、稅費等公務事項佈告，我們以爲是村裏的公共活動場所。後從門縫往屋內張望卻發現裏面有神龕，經瞭解才知道這就是羅家祠堂，神龕上擺放著羅家列祖列宗的木主牌位，上方有一匾額書「理學家風」。可惜，保管祠堂門鎖鑰匙的人不在，我們無法一睹其具體面貌。我們只好繼續向羅家白氏太婆墓所在的山麓前進，沿著農田的溝坎，穿越一片荊棘山林，終於發現了一尊矗立在山麓旁的低矮石碑，在踏平石碑周圍的荊棘後，終於見到了石碑的真面目，碑上刻有「□□後土神」，其中「後土」兩個字，使我們想起在廣東、福建等地考察客家墓地時的景象，即一般客家祖先墓周圍都有刻有「後土」的石碑。在離石碑不到一米遠的茂密樹叢中就是羅家白氏太婆墓。這個墓其實處於農田和山坡的交界處，由於荊棘和草木的遮擋，使我們走了彎路。在墳墓不遠的山路轉彎處有一顆巨大的樹，同行的舒老師說那是村子的「風水樹」。白氏太婆墓依山而建，墓前豎立着一塊巨大石碑，上有屋簷式的碑頂，碑兩邊有附碑。所有的碑刻因年代久遠均已無法通讀。正中主碑自左至右刻有「清同治三年歲次甲子（以下不清）……清故顯妣羅母白氏（以下不清）……」，左邊的附碑內容完全看不清，右邊的附碑內容有「戊辰 三房祀男芳慶 么房祀男廷慶 孫成文」等字樣，橫眉有「地靈人傑」。在正碑兩側自右至左有碑聯爲：「□讓牛眠稱吉地，還同馬鬣起高封」；兩塊附碑兩側自右至左有碑聯爲：「明承福地，□水起秀。」

我們在離白氏太婆墓不遠處，向一位中年男子瞭解情況。他說，他周圍的住戶有百餘人，

全部姓羅。他們家的祖公墓在新橋村，至於祖公和祖婆為何分開埋葬，他不知原因，建議我們向老一輩人打聽。我們一邊打聽一邊下山，想回到羅氏祠堂看看保管鑰匙的人是否已回來。在臨近祠堂的路上，一位老婆婆詢問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告訴她想看一下羅氏祠堂，她很爽快答應幫我們找保管鑰匙的人。在等待這位婆婆找人的空隙裏，我們與一位坐在家門口曬太陽的老人攀談起來。老人姓劉，已經八十多歲了，說自己是「土廣東」，其理由是其家族族譜與湖廣人族譜對不上，與「土廣東」能對上。有意思的是，老人的妻子為成都土門子張家女孩，且張氏是湖廣人，嫁過來後也能用土廣東話交流。看來客家人與湖廣人等其他移民羣體都可相互通婚，並不是以往所說客家人不和其他族羣通婚。據老人說，劉家的祖公墓在土門子附近，其祖公娶兩個老婆，都與祖公葬在一起。當我們問起羅家白氏太婆墓時，劉大爺並不知曉。他建議我們訪談羅家老人。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幫我們找人的婆婆回來了，她說管理祠堂的人沒找到。我們感謝之後詢問她是否瞭解有關羅家遷川的歷史，她邀請我們到她家詢問其丈夫。我們跟著婆婆到她家訪問。婆婆姓戴，七十多歲，三歲時，父母雙亡，對戴家的事一無所知，後來嫁入羅家。戴婆婆叫來了丈夫以及另一位比丈夫年齡稍小但輩分卻為叔叔的老人。我們從《羅氏族譜》³瞭解，羅家入川一世祖為白氏夫婦，入川二世祖有五人，後一房絕嗣，所以真正的二世祖為四房。與我們聊天的年齡偏小者為羅家在東山的么房，戴氏丈夫為長房。年齡偏小者受過一定的文化教育，在聊天中一直掌握著話語權。他的許多記憶來源於《羅氏家譜》，因為舒畢生手裏有《羅氏族譜》，羅家老人不時借用族譜內容描述其祖先。比如他說，羅家祖先有九妻十八子，其中15個兒子考中狀元。他還說，四川的羅家祖墓和祠堂前都有石桅杆，這象徵著其家族出過人才。但《羅氏族譜》記載顯示，所謂「九妻十八子」是羅家在福建發生的事，和四川沒有關係。羅家移民四川開始於清初。羅家老人的記憶已發生了對某些不同時段

的歷史「嫁接」。這一現象說明，移民後裔的歷史記憶可能與老輩們在口述家史時的「選擇性記憶」有關。但這種錯位記憶卻讓我們感受到客家人在四川為了提高其社會地位而將族譜中「英雄史」移位嫁接並放大。

當我們向幾位老人瞭解當地神靈祭拜的情況時，他們也不知道廣東移民建立過南華宮及供奉六祖的情況。但他們說，在其村落附近的羅家廟有川主廟，以前每年都舉行祭拜儀式，祭品有羊和豬腦。因為東山一帶為山地丘陵，祭拜川主的目的是求雨。據說，這一儀式到了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內都被保留着，曾由生產隊集體負責管理。「四清」以後，因破除迷信，川主廟被毀，祭拜儀式也不再搞了，直到今天也沒有恢復。他們還說，當地以種植紅苕為主，這是一種經由客家移民傳入四川並廣泛種植的高產糧食作物。廣東客家移民信奉六祖，建有南華宮，這在洛帶鎮上就有分佈。但在山區卻沒有留下這一民間記憶的空間。我們認為，南華宮確實在客家地區存在過，但時間上可能是在移民畛域較清晰的清中葉以前。晚清以後，隨著移民向土著化邁進，原籍鄉神信仰已退居其次，並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在認同四川新家鄉時，自然也就接納了四川人共同信仰的「川主」，況且川主能解決生產中遇到的乾旱問題，這一點是居住在山區客家人最關注的大事。

我們還向老人們詢問了羅家在當地的嫁娶情況。據他們說，羅家較多與土廣東人結婚，而與湖廣人結合則較少。羅家老人說，在他們居住的區域，張、羅兩姓長期禁止通婚，因為傳說張、羅兩姓為一家人。這之中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大約是羅家遷入到東山地區後，有一個祖先因犯罪被官兵追捕，他在情急之中躲在了路旁高高的芭毛（一種草本植物）裏，官兵沒有發覺。過了一會兒，官兵突然沿路折回，看見了羅家這位祖先，就問他姓名，這位祖先急中生智回答「姓張」，這一支房後裔以後都改為張姓。於是羅家規定羅、張不能通婚。這一規定至今仍被延續著。這一故事的真實性如何？我們無法判斷。但類似這一故事的還有華陽范氏，范氏規定范、劉

不能通婚，但理由和羅家有區別。1989年筆者曾在成都市金牛區龍潭鄉同仁村10組訪問過71歲的范姓老人，他說，范家入川後，因家族人口發展太多，輩分無法排下來，於是家族商議部分房支改他姓，龍潭鄉一帶的范姓就改為劉姓，故當地有「劉范是一家」和「范劉不通婚」的說法。在這些故事的背後，是不是隱藏著客家與土著、客家與非客家族羣之間的利益爭奪？還有是否因客家人後到四川，爲了插佔更多的土地，而把家族人口臨時分開，以方便佔取更多的土地。當然，也不能排除部分客家人到達四川後成爲遊民，因擾亂社會而遭到官府的通緝。

在我們採訪的羅家男女中，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成都東山一帶的客家女性普遍纏足，至少羅家女性包括娶進來和嫁出去的女性無一例外都纏足。纏足並不影響女性參加田野勞作。這一現象與客家大本營的廣東等地相比有較大差異。按羅家老人說法，清初羅家有好幾房入川，到達四川後，將廣東祖籍的祖先骸骨分開，由各房帶往自己插佔地供奉。石碾村羅家分到的是玉欽公骸骨，具體是哪一塊已不清楚。據光緒《羅氏族譜》記載，玉欽公爲廣東十三世，其子起麟和妻白氏攜子入川。起麟公生有五子，其中一子爲入川途中所生，「路過資州，隔此四日之程，時值臨產，寸步難行，即在斯地站劄四十日，始往此地。言念及此，令鐵石人聞亦知墮淚。」至於白氏太婆爲何與起麟公分開埋葬，老人們也不知曉。

在石板灘鎮考察期間，得知石板灘在清代屬華陽縣管轄，解放後劃歸新都縣，現爲成都市成華區下設的一個鎮。這裏在清代屬於華陽與簡州、金堂、新都等交界地，據新纂《新都縣石板灘鄉志》⁶記載，早在乾隆三十年（1765）就有廣東移民建立的南華宮，清末爆發的紅燈教反洋教的女首領廖觀音就是廣東客家移民。我們按《四川客家歷史與現狀調查》中〈石板灘鎮〉⁷條記述，選中了該鎮馬家村12組李家祠爲考察重點。路途上經過不斷打聽，終於找到李家祠堂大致方位，正在我們向路邊的一位婆婆詢問祠堂的具體位置時，得知她就是保管祠堂鑰匙的人，在知道

我們的來意後，她熱情地將我們引向李家祠堂。祠堂大門的匾額爲「珍公老祠」，門簷上分別刻著「福」、「壽」字樣，祠堂屋宇保存尚完好。珍公即爲李家入川始祖李珍魁。進入祠堂發現該祠堂分爲前後兩楹，中間爲天井，前廳的屋脊樑上刻有「萬代興隆」的字樣，這與《李氏族譜》扉頁的記載一樣。前廳的牆體上高高懸掛著三塊節孝木牌，字跡依稀可見，分別爲「皇恩施表節孝 李其暉之妻劉氏」、「皇恩施表節孝 李其昉之妻葉氏」、「皇恩施表節孝 李其嘏之妻黃氏」。看得出這是經過清代官府認可的精神獎勵，顯示了李家以此作爲獲取社會資源的一種手段。

在李家祠內天井右側的牆上，鑲嵌有五通高度統一但寬窄不一的石碑，但字跡已經風化得極難辨認，大意是說珍魁入川的經過以及其四房後裔如何商議建祠與設立宗祠蒸嘗管理章程，落款爲同治六年歲次丁卯孟冬月下廡穀旦。而在外天井左側的牆角處有幾根斷裂的石柱，上面刻有「神通廣大護川民」和「□□雄威留粵土」兩字句。據李家一位老伯說，李家始祖入川時從廣東帶進了地方保護神三都司，並在四川建立了家族式的三都司廟，這些石柱就是三都司廟的廊柱，後來三都司廟毀壞，人們把石柱搬進了祠堂。據這位李大爺說，當年，其始祖背著三都司神一起入川，途中遇到大河，搭人過河的船工只搭人不搭菩薩，他們的祖先只好把背著的三都司卸下來，安放在河邊，燒香，點錢紙，並對三都司神像說，對不起，不是我們不願意背你了，是船工不搭你，只好把你安放在這裏了，您就好好待在這裏吧，我們先往四川去了。於是他們就上船了。然而萬沒有料到的是，船還沒到岸，他們的祖先就看到三都司已在河對岸等他們了。他們便繼續背著三都司前進，直到在四川落籍的地方建立祠廟祭拜，並把三都司神刻成石像。我們在李家祠堂神龕一角看見三尊已被破壞了的三都司石像，其中一尊有頭，另外兩尊只剩下石基。旁邊的一塊石碑上依稀刻有關聖帝君、天后娘娘、觀音大聖等字樣的神位，大約也是曾放在三都司廟內的。這一點頗類似於廣東人典型的雜神信仰。

現存的《李氏族譜》⁸記載說，李珍魁夫婦帶著兒子、兒媳及孫子共八人向四川進發，「一路同伴有楊、馮、繆、江、黃，六姓十九戶，同心虔誠祀敬三都司張、李、毛三位靈神來川，一路順遂，萬無一失，舟渡楚江，風波巨作，眾皆失色。於是大呼三都司救命，霎時，風恬浪息，路途賴以安寧。」等六姓人家在四川安定後，遂聯合建廟祭祀三都司。

李家祠堂正廳的神龕上擺放著祖先牌位，上面的橫額為「理官柱史」，兩邊懸掛的神榜楹聯為「將軍世澤千秋衍慶，宰相家風萬古流傳」。神龕正面刻有「克昌厥後」，下面上香的地方張貼著不少請來的神符紙畫。祠堂內的牆壁上貼滿了近年來李家子孫祭拜祖先的費用來源及其開支情況。李家祠堂神龕上的牌位寫著「李氏堂上^{昭穆}歷代先祖考妣之神位」。

祠堂神龕上的兩塊木主牌從外表來看很簡單，同行的舒畢生讓我們把木主牌拿下來打開看看，原來裏面藏有一塊刻有「清顯考妣□□□□神位」的牌位，打開牌位盒蓋，內側有：「父生於康熙九年庚戌歲八月二十三日酉時，卒於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申時，陽年八十加七」，「母生於康熙十二年癸酉歲八月二十三日寅時，卒於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子時，陽年六十有五」；神主木牌內寫有：「遷蜀始祖清待^{贈諡穆勤李公諱真魁府君大}人之神主，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溫母魏太君老孺}八月內，自廣東省長樂縣錫坑移於四川省成都府華陽縣石板灘居住。」

另一神主牌位的外面寫有「清顯^{考李公諱若妣母周太君}煥府君大老孺人之神位」，蓋板內從左到右的文字為：「生於康熙己亥年十一月十一日亥時，皇清待誥諡勤惠李母周老孺人一位之神主，卒於嘉慶四年己未歲九月初六日申時」，底板內從左至右文字為：「生於康熙五十年辛卯歲五月初六日未時，陽年七十三歲，清故顯考諡康義諱若煥李公府君一位之神主，卒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九月初八日辰時」。

另一塊木主牌位上寫有：「顯^{考李公諱萬華妣母鄒}老府君香位立祠祀男^暉暉^普」。我們在訪談中特別留意李家為何居住在「馬

家村」這個村落。被訪問的李大爺告訴我們，現在的馬家村只有極少數外姓，絕大部分均為李珍魁的後裔，都姓李。其原因是，當年他們家的始祖李珍魁進入馬家村時，已經有了這個名稱，大約已經得到了官府的承認。那麼，為何會出現馬家村沒有姓馬的呢？據說，馬家⁹先抵達馬家村，李家後到。李珍魁夫婦在廣東時已有五個兒子，入川時，留長子守家，帶著四個兒子，其中二兒子瑾公夫婦育有一子，一家共六口抵達四川。李家到達馬家村時勢單力薄，馬家是當地大族，家裏養了40名打手，馬、李兩家因為用水灌溉而屢屢發生衝突，李家總是處於下風。為了能在當地站住腳，珍魁公於是回到廣東將大兒子一家人也帶到四川。傳說李家入川祖婆魏氏雖然纏足，但會武功，大兒子也會武功。一次魏太婆和大兒子一起在田野裏踏水車灌溉，馬家的打手又出來滋事，大兒子隨手將田埂上的青樹連根拔起，把馬家的打手打散，李、馬兩家於是在仕宦的調解下到聯宗祠¹⁰喝茶評理。但是馬家的人不去，於是大兒子便捉住馬家主人，將其夾在胳膊下，結果那人動都動不得一下，臉都被逼青了。馬家這次和李家的較量，明顯處於下風，可能由於馬家經常欺壓百姓，在聯宗祠的評理中也沒佔上上風。後來馬家就逐漸遷出了馬家村，搬到龍潭寺附近的馬桃子八里莊居住。最終馬家村成為李家的主要生活繁衍地，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李家保留下來的《李氏族譜》也記載說，李家到石板灘「落業以後，馬姓恃強霸水，珍公復回廣東變彥，與長子槐公夫婦一齊至川」。族譜的記載僅此而已，也許李大爺的傳說就是從這裏敷衍而出並不斷加以神話。這個故事顯示，隨著眾多移民進入四川，有關田土、水利的利用問題，移民之間確實曾產生過糾紛，這些糾紛的處理辦法可能還是根據移民的家族實力私下解決。這也許是四川移民在早期頻繁移動的一個原因。對此，《李氏族譜》也記載說，李珍魁夫婦於康熙五十七年入川，先居住在與成都府毗鄰的潼川府，據說李珍魁「善貽謀，不三年，創業築基，因宅後有墓古一塚，被不良鄰家冒為祖墓，藉端構訟，經縣主訊明息事。公曰：『昔人擇鄰而處，斯地何以吾

居也。」乃棄其業，徙至成都府華陽北門外五十里，地名石板灘，上流西江河馬家沖居焉。……（雍正五年）在此鼎創大業。」儘管族譜說李家在潼川府與鄰家糾紛經官府「訊明息事」，但從李家很快遷到華陽來看，官府對移民社會控制尚不到位，移民間之衝突可能以私下調解為主，否則只能選擇再遷徙他處。當李家從潼川府遷往成都府華陽時，把三都司也帶到了馬家村，並建廟祭祀。

臨近傍晚，我們向李家人道謝辭別，在路過成都市新都區木蘭鎮時，我們訪問了原鎮長劉先生。據他說，木蘭鎮98%以上都是客家人。他本人也是客家人。劉先生將其負責編寫的《木蘭鎮志》（2008年4月列印稿）拿給我們看，其中第十五篇〈客家文化〉、第十六篇〈社會風土〉均記述了木蘭鎮的客家情況，因該書尚未正式刊印，在劉先生的許可下，我們對某些章節進行了拍照。

在田野調查期間，我們還專門拜訪了舒畢生家。舒畢生拿出其近年在東山地區拍攝的客家祭祖照片，並告訴我們，他近年來一直關注四川客家研究，尤其對客家移民路線有較大興趣。他在四川內江一帶做田野時發現，至今在豐都鬼城一帶還流傳着移民賣船的故事。據說，移民乘坐木船通過水路進入四川後，大多上岸陸行，以便在路途中尋求合意的耕地。此時若仍帶著木船行走，既不方便，也會增加成本，遂將木船賣給當地漁民。其實，有關移民乘船經由水路或水陸並進入川的情況，筆者在多年前已從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宮中檔雍正朝奏摺》中發現不少官員的描述，並以〈十八世紀廣東移民四川路線考〉¹¹進行分析。舒畢生的調查證實了這一被正史屢屢提及的水路，至今仍在民間社會被「集體記憶」地傳承。這為我們解釋「湖廣填四川」的種種傳說提供了裨益。

我們在四川省圖書館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訪問時瞭解到，這一區域涉及的地方文獻眾多，僅地方志就有多部，如乾隆《簡州志》、咸豐《簡州志》、光緒《簡州續志》、民國《簡陽縣志》、民國《簡陽縣續志》、嘉慶《華陽縣

志》、民國《華陽縣志》、乾隆《新都縣志》、嘉慶《新都縣志》、道光《新都縣志》和民國《新都縣志》等。除了這些官方文獻外，還有大量的族譜以及文集筆記等著述。這些文獻也為我們深入研究清代四川移民史提供了助益，為今人研究清代四川移民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通過對成都東山地區的考察發現，客家移民的家族觀念頗牢固，即使不識字的老人也知其祖先何時何地遷入四川，且多有族譜存世。現有的族譜多把清初入蜀一世祖立為入川始祖，並詳細記述入川始祖創業的艱辛歷程，如宣統龍泉《萬氏族譜》¹²記載，其始祖安靜公生於粵之長樂縣，「有四方志，但困於貧而未遂。苦作山傭者二十年，知故國不能發跡，遂於乾隆六年辛酉歲（1741），慨然暨刁孺人，攜長故，辭粵遷蜀。時公年三十六，孺人年二十二，長故僅二齡。一行三人，征途落寞，行李蕭條，跋涉五千里，直抵西川成都之鳳凰山，編茅而處。是我蜀中之始祖也。」又如光緒《盧氏族譜》¹³記載，入川始祖仁彥公「聞西蜀膏腴，鄉里多遷之者。……將田園廬舍遂以出售，作盤費之資，具行李實囊橐，擇吉於乾隆戊寅年（1758）正月吉日，攜二、三、四子，望西蜀而前往。越三月餘，始至成都府華陽縣北門外隆興場，依族盧朝華居焉。」從此也可以得知，廣東移民入川大多是以家庭單位，入川的目的是「發跡」，且多有入川的盤纏，即變賣家業作旅途費用。當然也有因生活所迫而入川的，民國《林氏族譜》¹⁴在追憶入川始祖培玉公時則說，始祖生於粵東長樂縣八井鄉，「適值明末清初，新舊交替之時，苦於兵役之繁，賦役之重，兼以潮惠一帶地方饑荒連年，民不聊生，不得已而為遷移之計。離東粵而赴西蜀，跋山涉水，路經萬里，備嘗辛苦，不過為吾子孫覓前程計耳。……我培玉公於前清雍正癸丑（1733）正月十三日，同胞弟培昌公入川。行至湖廣衡州，昌公患病，遂卒於中途。雁行分翼，就地安葬，仍攜昌公之黃孺人、俊清公，至四川成都縣繁陽山、華陽縣太平橋等處，立業居住。」

清代前期，客家人拖家帶口落籍四川，至今約在三百年左右。這些移民分佈在四川各地，

有的已融入當地社會，但在四川和重慶仍有不少客家移民方言島。這之中，成都東山地區頗為典型。隨著學界與政府對四川客家的共同關注，成都於2001年舉辦了第七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2005年又舉辦了世界客屬第二十屆懇親大會，東山地區客家成為世人關注的熱點，東山成為巴蜀兩地保留下來的最大客家方言區，不同學科的學人走進東山地區，民間私家保存的族譜被不斷發

掘，移民家族祠堂、碑刻也進入人們的視野，客家人也因此開始構建對祖先的歷史記憶。但清代客家移民入川後，如何處理與他者的關係？如何建構與認同四川社會？移民向定居社會的轉型有無具體的表徵？這些問題至今並沒有得到解決。成都東山豐富的移民史資源，為我們研究清代華南地區鄉村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提供保障。

註釋

* 本考察報告專案來源：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承擔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明清南方鄉村地區人口與移民的歷史人類學考察」（07JJD840199）之子課題「明清成都地區鄉村人口、移民與社會」。

¹ 楊興梅，〈從勸導到禁罰：清季四川反纏足努力述略〉，《歷史研究》，2000年，第6期，頁80-95。

² 吳震方，《嶺南雜記》，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史部，第249冊，頁502。

³ 張渠，《粵東聞見錄》（卷上）（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頁52。

⁴ 劉義章、陳世松主編，《四川客家歷史與現狀調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⁵ 《羅氏族譜》，手抄本（舒畢生收藏）。

⁶ 新都縣石板灘鄉志領導小組，《新都縣石板灘鄉志》，1984年。

⁷ 劉義章、陳世松主編，《四川客家歷史與現狀調查》，〈石板灘鎮〉，頁309-327。

⁸ 《李氏族譜》，手抄本，成都市石板灘鎮馬家村12組李家祠堂收藏。

⁹ 馬家祖籍何地已經不清楚了，我們在翻閱《木蘭鎮志》時發現，馬為當地大姓，其始祖來源於江西和廣東兩地。

¹⁰ 李大爺說了聯宗祠後，我們追問聯宗祠是怎麼一回事時，老人家已說不清楚，隨後又改口說是茶館。我們懷疑可能是廣東移民在當地的地緣組織，比如南華宮等的廣東會館。

¹¹ 〈十八世紀廣東移民四川路線考〉，《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90年，2期，頁47-51。

¹² 宣統龍泉《萬氏族譜》，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收藏。

¹³ 光緒《盧氏族譜》，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收藏。

¹⁴ 民國《林氏族譜》，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收藏。